

客商

KESHANG

从近代第一个投资铁路的华侨张煜南到“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再到“领带大王”曾宪梓，客家商人在穿越历史的烟雨中演绎着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商业传奇……
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中，他们又将展示出怎样的雄姿？

主编 谭元亨



人民出版社



KESHANG

THE KESHANG GROUP IS A LEADI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GROUP
WITH A LONG HISTORY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1994-2019



THE KESHANG GROUP IS A LEADI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GROUP
WITH A LONG HISTORY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客商

KESHANG

主编 谭元亨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张文勇 何 奎
责任编辑:何 奎 王亦妮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商/谭元亨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01-007284-5

I. 客… II. 谭… III. 客家-商业经营-研究-广东省 IV. F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8623 号

客 商

KE SHANG

谭元亨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01-007284-5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引 子

明清以降，晋商、徽商、广州十三行商人，几乎同时称雄于中国大地。随着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式微，粤商、浙商崛起并融入了国际现代经济大舞台，长盛不衰。

但很少人知道，近代被视为粤商首席代表、从“红顶商人”演变为民族工商业之翘楚的张弼士，却是一位客家人。

本书所展示的，正是粤商中鲜为人知的一大方阵——客家商人。

前言

品牌的打造：客商的历史与今天

商人：革命的元素之一

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滋养了丝毫不比地中海逊色的海洋商业文明，催生了可与亚历山大港、威尼斯相媲美的广州、潮州、泉州等闻名遐迩的古港，而粤商则应运而生。屯门一声炮响，热武器的出现宣布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在东南沿海开始了它的近代转型。明中叶，晋商、徽商也包括粤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然而，由于粤商早早拓殖海外，迅速接受了世界先进的现代商业理念，有着全球的宏观视野，以及贷殖五洋的宽阔胸怀。他们出手不凡、大气如海，从而成为了近代民族经济的先驱，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在依附封建权势的晋商、徽商迅速沉没下去之际，粤商仍如日东升，把传统的商业会馆转变成现代公司，摘掉了“红顶商人”的名号而争得了自主经营、独撑商局的权利；同时，更支持了由东南沿海启动的中国民主革命，掀翻了千年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以说，正是粤商——民族资本，成为了这次革命牢靠的根基。反思历史，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很明显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官商，一条是民商，或者说，前

者是官僚资本主义，如洋务运动，打上了很深的封建烙印，最后归于破产；另一条则是民族资本主义，带有自由资本色彩，广东则是后者。后来的粤商，少有官府背景，是广东人自己积累资金发展起来的，包括靠被“卖猪仔”、下南洋、办矿业、做生意来的。孙中山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其中粤商的支持显而易见，这也是辛亥革命的经济基础，是民商、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撑。时至今日，这一结论，已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无论商人个人的倾向性如何，对于封建社会而言，他们每每是一个颠覆的因素，凭此不难解释在中国古代，商人被列为“末流”，不断遭到钳制与打击，动辄有籍没、流放、杀头之险。一位思想家曾说过：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绝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

这一论断表明处于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商人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非自觉的身份。这用在粤商身上多少是有几分吻合的。正因为这样，粤商早早从“共同体”中挣脱出来，不至于似晋商、徽商一样与这个“共同体”一同沉没，不敌现代的金融业与工商业。于是，东南沿海成规模的大工业、大交通业，便在粤商手中崛起。所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利希霍芬在几度考察中国后，便有了如下的结论：

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一样的价格……
大商业属于广东人……
广州市及其附近的开化种族，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广东人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

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才能……

无论他是怎样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做出的评价，但他道出的毕竟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在中国未完成民主革命前约半个世纪，粤商的力量已经非常鲜明地展现在外人的面前。这便是粤商（或者应包括浙商，因上海开埠而崛起的浙商）之所以比晋商、徽商“长寿”，仍能不断壮大之谜的根本解答。这几段话证明，粤商能迅速地与现代工商业、规模化生产及大交通相接轨。这也有力地证明，中国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为何会发生在广东——经济因素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对粤商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变革，尤其是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商业资本，尤其是商人的价值与功能，当是非常必要与极为迫切的。这对于推动我国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很有现实意义。

2 轻商与亲商

本书研究的是粤商当中的重要一部分：客家商人。

粤商是广东商人的总称。广东人的组成有三个部分：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因此，这三大民系的商人，也就分别被称之为广商、客商与潮商。

粤商三大商帮，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才对外有粤商的统称。上一节涉及粤商种种，当是他们所拥有的共性。但在这共性下，各个商帮也还是有其鲜明的个性。毕竟，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与山地。仅地理环境，也都会造成民系品性的落差，而各大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更造成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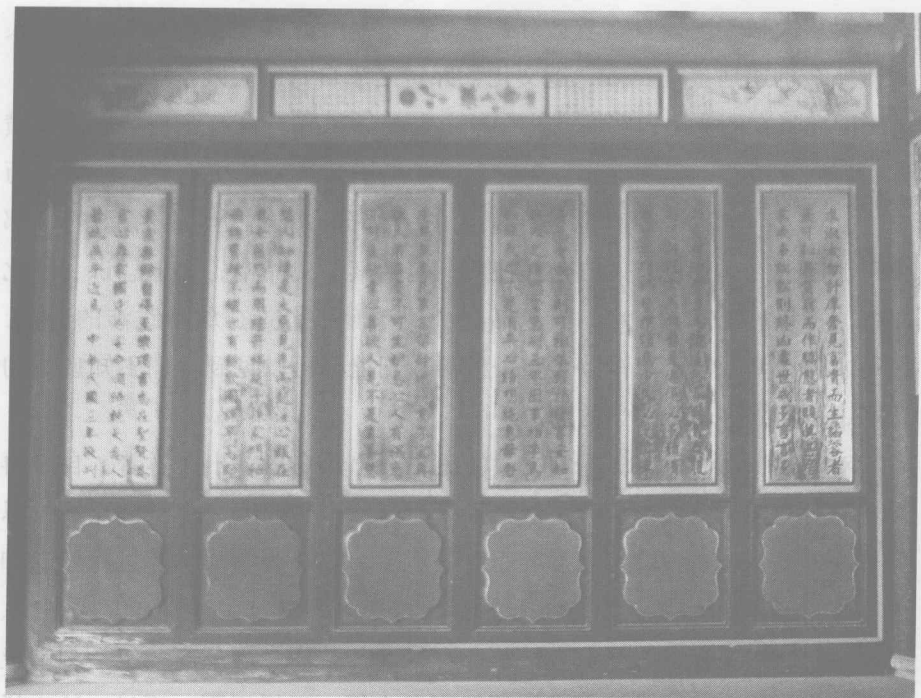
广府人是最早到达广东的，占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扬帆万里的主角；潮汕人稍后才到，占有了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商贾活跃，那里曾被恩格斯称之为“最具有现代商业意

味”的港口，其商品意识也早已形成。

客家人却是最迟来到广东的，他们先到了粤东北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并成蛙跳式布点于全省。客属地唯一的出海口，便是当今深圳、新界一带，所以，海洋商业文明对他们而言，是较后才接受的。而他们身上的中原文化或儒家文化色彩，则比另两大民系要浓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海洋商业文明的接受会艰难得多，毕竟，从千年大迁徙过来的这么个民系，有着特别的革命性。且不说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是客家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还有当时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黄遵宪等也是客家人，尤其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邹鲁，以及“干革命，有两达”（孙中山语）的张民达、邓演达都是客家人。而且土地革命时，中央根据地几乎与客家大本营是重叠的，从赣南、闽西及梅州，走出了数以百计的红军将领以及共和国的元帅——他们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接受，可以说，始终走在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前面，引领了中国几乎每一场革命，以致为全世界所瞩目，甚至太平天国被视为



黄遵宪的人境店



桥溪祖训

“客家人的革命”。笔者曾在《客家与华夏文明》一书中，归纳出三条，作为对客家人在近现代崛起之谜的解答。第一条是讲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的文化，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守护它、保卫它并丰富它，而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积弱之际，而后更面临两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不能不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在民族危亡中挺身而出。第二条是在千年迁徙中滋养出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流亡者，不在沉沦中奋起，便在沉沦中寂灭。而客家人却在危难关头，把握历史之舵，穿越“死亡之门”，令“沉船意识”激活出生存智慧来，从而抓住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无论从政、科研，还是经商，皆如此。第三条则是大迁徙上的风云变幻，培养了他们敏锐的历史目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慵懒沉滞，固步自封，是无法在大跨度的迁移中增长见识，并能及时接纳八面来风，嗅得到历史风暴来临气息的。

这证明从太平天国始自《资政新编》，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客家人为何那么迅速地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并付之于自身的实践。

因此，在商业上，客商亦能在粤商中独领风骚。在商业领域中，纵横捭阖、恣意驰骋，引领潮流，终成大器，也正因这一历史底气，或曰：历史的大背景。毕竟，客商也是客家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属于精华的一部分，他们自然具有客家人的全部特质，包括其历史品格、忧患意识、文化自尊、善感敏锐等。当然，更包括这个民系勤于奔走、敢于跋涉的特征，把足迹遍布南中国、南洋以及整个世界。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不知疲倦的背影，他们披荆斩棘开出的商道……

对于这个革命性强、又重文教的民系，出革命者、出大学者，自不再奇怪。可对于大山之中，穷乡僻壤，出商人、出实业家，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的确，在清中叶之前，客商似乎不多，在粤商中几乎不见踪影，如著名的十三行商人中，怎么也找不出客商来。那时，在客属地，像兴宁、龙川、汀州，也是商旅羁留之地，也有盐商、茶商、烟草商，包括刻书业亦有一定影响，却未有清末民初那般声名大振，远播天下。不过，这也说明，客家人在早年，也并不排斥从商。

乾隆时期，嘉应州籍的举人，也是诗人、学者的李坛，对海外通商颇有感触，诗曰：

……

东南际天国万数，
背趾相望此握吭。
红毛鬼子蜂屯集，
峨舸大舰交风樯。
殊方异物四面至，
珠箔翠羽明月珰。

他是很激赏这种通商的繁盛，并无迂腐文人那种酸馊气味。所以，诗

中还进一步写道：

“大开理蕃受朝贡，
往来都会相梯航。

这“理蕃”即理蕃院，受理外国人的事务，《清会要·理蕃院》中载有：“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以布国之威德”。诗中的“大开理蕃”，实际上是力主大开国门，可见客家人对国家的开放政策历来是持有热望的，他甚至期盼：

尔来太平越百载，
海气净扫无秕糠。

其中已有寄望商业富国之意了。

后来任新安（即宝安）知县的客家人袁嘉言，也有诗云：

岛外鲸鲵沉浊浪，
空中鸾鹤舞回飙。
即今万国柔怀日，
重译都来奠酒椒。

都有非常豁达的开放胸怀。

这几位官员、诗人，身为客家人，并不对经商、通商有什么芥蒂，反而很欢迎、很重视。这也算是一个例证——诗证与人证。所以，至清末客商也就纷纷冒了出来。

分析起来，第一还是天时，即历史环境使然。这个时期，五口通商后，山里不少人，依客家人习惯，大量往外跑，经松口，下汕头、走南洋者数不胜数。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也加大了力度。革命者涌现出来，商人

也一般出现了，商品流通当比过去要发达得多，信息传播也快得多，加上客家人能吃苦耐劳，勤俭好学，不惧风险，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着天生的优势，所以从商也屡见成功者。当然，他们的文化素质，自因“人文秀区”之故，也比其他商人要高。诸如张弼士、姚德胜等人，也都是这个时候成了粤商中的顶尖人物。

其次，则在于自然环境。说大山环绕，穷乡僻壤，不错。这里的耕地面积之少，也是很明显的，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实，山地丘陵，要占到86%还多。明清之际，发生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就是因为集聚在梅州的客家人口过于密集，造成生态失衡，不得不自觉“间苗”，返赣南、走云桂、下台湾、上四川、分粤北，所谓“一枝散五叶”。尽管这样，没过一两百年，人口又再度密集起来，加剧了土地与人口的尖锐矛盾。这样，放弃农耕，从事手工业与经商，走出山地丘陵，把天下视为人生奋斗之舞台，也就成了不少客家男子的首选。加上又有一个“牢靠的后方”，客家女不仅会持家，还善农耕，令他们无后顾之忧。当然，“等郎妹”、“隔山娶亲”的悲剧也由此而来。



松口元魁塔：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见证

客家人好向外发展，这是大迁徙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种传统。这当是客商能迅速崛起的又一个原因。他们在东南亚，在更远的非洲、美洲，都有着深深的履痕。汀江、东江、梅江、韩江，一线下来，直通南海，成了客商创业的必行之路。而“客人开埠”的美名，更令他们在异域不惧荆天棘地、毒蛇猛兽，敢于开拓，艰难创业。既往张理大伯公、罗芳伯，以及叶亚莱的业绩或传说，无不激励这种奋起拼搏的开拓精神，尤其到19世纪、20世纪，国门打开了，商机亦更多了，他们能不争先恐后而去么？

这说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条。

3 文化优势与当代容量

同样，今日的改革开放又再度把这三大有利条件推到了前面。尽管客属地有后来居上、蓄势待发的条件，但在早些年，经济上还是不尽如人意的。不过，却仍有大批的客商涌现了出来，成为今天“新粤商”中的一支生力军。至少，天时、人和已经具备，而地利，则由于几大高速公路近年通车，也初步具备。

这些年，海外的客商为反哺客属地，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功臣。没有海外华商（包括客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们讲的“利用外商”，在前十多年间，几乎都是海外华资，今天大部分投资仍是如此。他们是很值得浓墨重彩写上一章的。

而从梅州到香港，无论是什么时候，成为客商的不在少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去的，当数以万计，其中不少创业有成，如今正踊跃回来投资捐资。香港是个国际化的自由港，商机之多，不难想象，这也给了客商一个成长的空间。从田家炳、曾宪梓，到余国春、林光如等一批客商，寻溯其创业的轨迹，自会有不少宝贵的启迪。

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从梅州到深圳的客家人，与去香港的不

相上下，而其中又以兴宁、五华居多。其中原因，恐怕是在于，深圳本身就是客属地，那里的客家人，大部分与梅州多多少少有亲戚关系，不少是清代迁海复界时去的，包括香港新界的也是。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客家人的吸引力非常之大。所以特区初创，外来的各种人，无论是打工的，还是从教的，最多的仍是客家人，尤其是梅州的。于是，客商在中国这样一个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产生了一种“群体激发效应”，温氏兄弟，缪寿良等等，可以说是一茬茬冒出来。这种人才效应，也只有在特区的同一个族群中才会发生，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自然，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也是吸引客商的重要地方。毕竟，这里的商业传统要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深厚，更何况省会也聚集有不少客家人。他们无论在政界、学界都卓有建树，人缘优势自不在说。广州又是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之一，商机自古以来都很多，现在则更多了。所以，这里冒出来的客商，也都是重量级的，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颇有名望。因此，改革开放，在广州获得巨大发展的客商为数不少。

而在梅州，来自所属各县市的客商也不少，他们也都找到了自己生长的

沃土，找到了商业的增长点。我们耳熟能详的，如宝丽华、客天下等，都与梅州的生态优势息息相关。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梅州是很有后发优势的，尤其是生态经济上大有可为，不必为曾有过的滞后而沮丧。况且，“人文秀区”、“世界客都”的品牌，就潜藏着巨大的商机。

因此，对于这部研究性的著作，尽管我们力图做得



雁南飞（宝丽华）

受众面广、可读性强，能够“文起八代之衰”，起到振奋客家人、客商精神的作用，但我们毕竟不可以离开本旨：从理论的视角上，探讨中国客商的历史发展、现代容量，以及所具备的文化优势、品格特性，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对于其经营理念、品牌打造、战略决策、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尽可能做出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审视，从而有助于后来者的借鉴与提高。

这一来，我们就如前所叙说的，分出了几大方面：一是海外，主要是东南亚的客商；二是港澳地区，那里已成长出有几代客商了；三是深圳，经济特区造成的客商群体；四是广州，作为省会给客商提供的商机；五是梅州自身，如何“后发制人”。

这五大方面各有千秋，对比之下，自有很多可研究、可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分五大部分加以分析，在鉴别中找出规律，找出闪光之处。不同人文地域，对客商的锻造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此外，对客商早期的历史，我们也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梳理与回顾，更何况如张弼士等客商，始终是整体客商的骄傲。叩问历史，方知现在，有近几代客商为参照，今日客商也愈见增色，他们本就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上的客商无疑是一面面高扬的旗帜，激励今天的客商奋勇直前。

4 资本、人才、品牌

可以说，“客商”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文地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亮点。客商的发生，植根这个民系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商业文明基础上的共识及价值趋同。研究这一历史至现实贯通的商业文化现象，也更具有社会价值。对于推动客商的创新和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客商的发展，从资本集聚，到人才集聚，一直到今天拼文化、拼战略、拼品牌，可以说在短短 20 多年间，中国内地上这样一支特有的民系所产生的商人，经历了人家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历史演进。时代的进步每每是这样令人吃惊，既往的“草根精神”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在知识经济、生态



经济中扎得更深，并长出新叶与巨干来，这都是我们共同思索的大问题。

我们希望，借助这一研究，能够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国际上，全力打造好“客商”这一历史品牌，使之达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历史地位，跻身于国际商帮的行列——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也是应该做到的。

我们更希望，借助这一历史研究，展示出今日的客商，与当代经济、尤其是知识经济大发展接轨的巨大优势，从而在未来的经济大跨越中特别是在知识、生态经济中，先着一子，争取更辉煌的前景。

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一研究，揭示出客商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粤商内，与广商、潮商相比较；在外，则与晋商、徽商相比照，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与价值取向，以及粤商中的客商的潜在的生命力。

晋商、徽商的研究已有不少人做了，但那毕竟已成为了历史。

浙商、苏商也有人在做，但他们做得更多的是今日的新浙商、新苏商，毕竟，上海开埠后，他们一直长盛不衰。

粤商，由于历来低调的传统，一直少有研究，尽管其有着显赫的过去与今天——这是前面能提及的各类商人所不具备的。那么就让我们以客商为开端，切入到这一南方经济高速发展的谜团之中，为读者揭开一个鲜为人知的勤奋、昂扬的世界。

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客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把粤商包括客商的旗帜高高擎起！



客家围屋